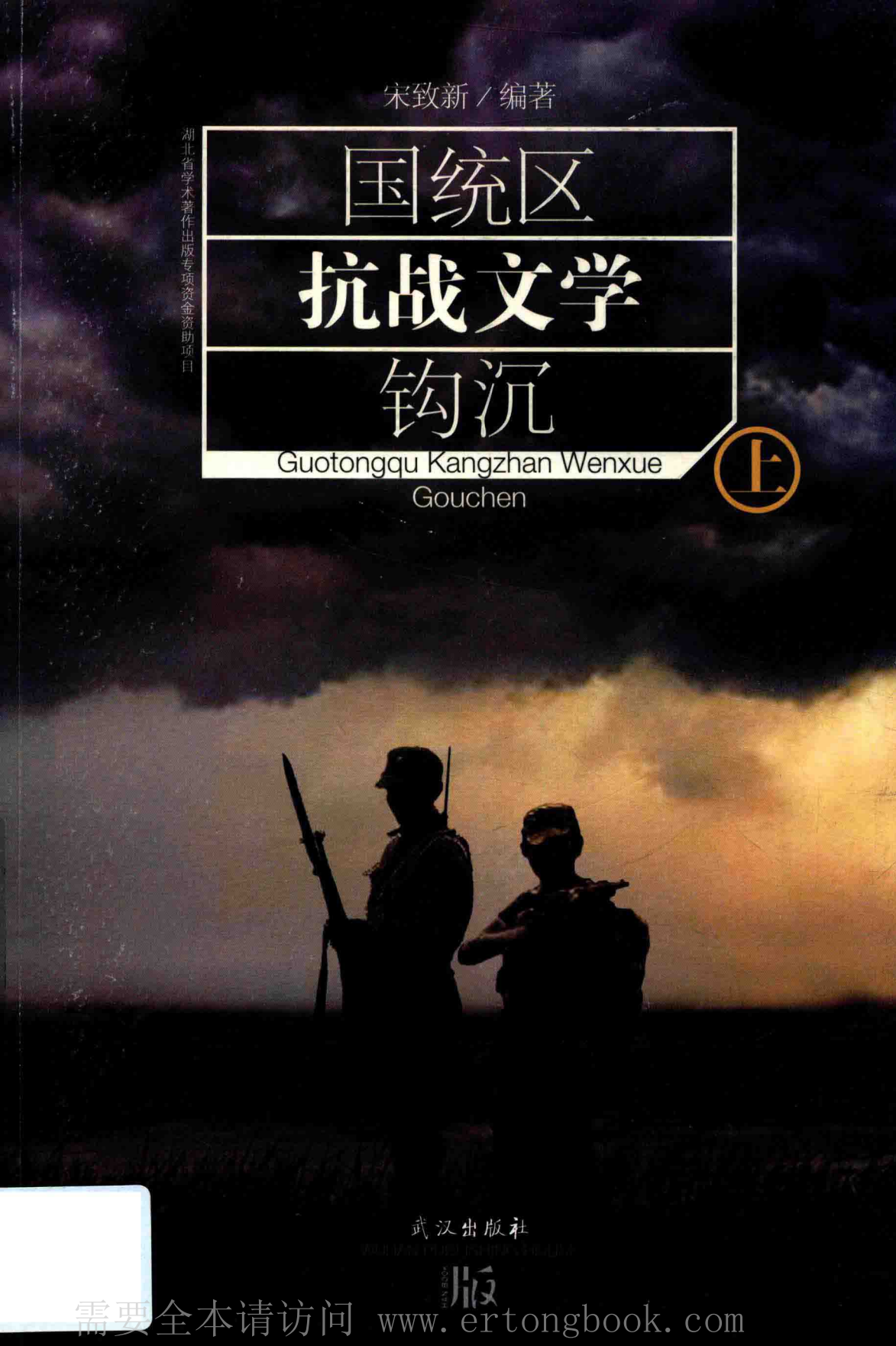
宋致新／编著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国统区抗战文学钩沉

Guotongqu Kangzhan Wenxue Gouchen

上



武汉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国统区抗战文学钩沉（上）

Guotongqu Kangzhan Wenxue Gouchen

宋致新／编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统区抗战文学钩沉:上、下册/宋致新编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582-0768-6

Ⅰ.①国… Ⅱ.①宋… Ⅲ.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总合集

Ⅳ.①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6830 号

编　　著:宋致新

责任编辑:廖国放

装帧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5.625　　字　数:828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折戟沉沙铁未销(代序)

宋致新

从1937年到1945年，积贫积弱的中国，在抗战中拖住超过155万余人的日本侵略军，从而消耗日军的力量，使之无法投向其他战区。中国抗战时间最长，所作出的牺牲最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也是最大的。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伤亡3120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80万人，总计伤亡3500万余人，8000多万人被迫流亡。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理应得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爱好和平国家更多的承认和更高的赞誉。

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政权倒塌。政权的更迭，使中国的抗战史，尤其是国统区的抗战文化，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收集整理，如今许多史料已湮没不彰，这无疑妨碍了今天的人们以“世界眼光”去公正客观地评价中国抗战业绩。近20年多来，挖掘整理国统区抗战史料的工作，正在大陆全面展开。国统区大量抗战时期“文物”破土而出，为真实展现当时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可靠依据。

这一挖掘抗战史料的潮流，也促使编者对75年前一家国统区报纸的文艺副刊——洛阳《阵中日报·军人魂》钩沉的兴趣。编者期望通过对其中一部分“原件”的钩沉，以及对作品背景、作者生平的考证与介绍，使今天的人们“穿越”75年的时空隧道，身临其境地走入抗战时期的真实生活，获得新的认识与发现。

1. 关于洛阳《阵中日报》(北战线)

洛阳，是中国抗战中一座不可不知的名城。

1932年，洛阳便被国民政府定为“行都”。国民政府虽然在搬到洛阳10个月后重返南京，但“行都”的称呼却一直保留下来。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洛阳作为通过西北大后方的要道，战略地位再次凸现。这里筑有坚固的军事工事，是第一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虽然它遭受过日本飞机数百次狂轰滥炸，却在抗战中巍然屹立了近7年时光。

1944年4月，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线，发起“豫湘桂作战”，国民党军队在38天丢掉了豫中30多个县，此役被称为国民政府军抗战史上“最大的耻辱”，但洛阳守军15军武庭麟部却进行了3个星期顽强抵抗，洛阳沦陷时已成火海，武庭麟部虽败犹荣（见《大河报》2015年5月25日载）。

洛阳老百姓说，“洛阳”，就是“落阳”。日军的“太阳旗”，打到洛阳，离“落”就不远了。

果然，洛阳沦陷仅一年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中国内战爆发，1949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洛阳成为全国最早的解放区之一。

时代的沧桑巨变，使洛阳在抗战中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往事，被岁月的逝水冲刷殆尽。

……

《阵中日报》，对于今天的读者，可能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报纸，而在抗战时期，却有很高的知名度。它是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办、责令各大战区承办、以供前线将士阅读的一份战地军报。

据河南老报人陈承铮在《河南新闻事业简史》中记载：

> “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蒋介石写了一个手谕，略称：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应在苏州、石家庄、太原分别出版东战线、北战线、西战线《阵中日报》供前线将士阅读，借以鼓舞士气。在内容方面，以报道战况为主，多载我胜敌败之消息；国际新闻方面，尽量刊登于我有利之消息。社会新闻一律不登。文字必须通俗易懂，免费发行，着运输部门逐日运往前线，并通令各司令部予以协助，不得有误。
>
> 当时，东战线《阵中日报》只出版了一个多月，就因国民党军队溃败而夭亡；西战线《阵中日报》也因日军后来进犯山西而未能开办；唯有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线《阵中日报》，虽然北方正面战场溃败，石家庄失守，但总算迁到郑州出版存在下来了。

《阵中日报》为四开四版。报头由蒋介石题写。初期下刊“北战线”三字，不署社址，以示保密。报头下方为“总裁训词”栏，每日刊登蒋介石的言论。报纸内容一版为要闻，以抗日战讯为主，遇胜利喜讯，则套红印刷。每日一篇社论，星期日为“每周一论”，邀请学者名流撰写，郭沫若、陈独秀等都为该报写过文章。一版下方辟有“地名辞典”栏，对战讯中新出现的地名加以注释。二版为国内政治新闻和专栏文章，如战地通讯、将领访问记等。三版上半版为国际新闻，下半版为“军人服务”专栏。四版为“军人魂”副刊。

1938年4月豫东吃紧，该报迁至信阳，后又迁往西安。1939年7月，该报改归第一战区长官部政治部指导，再迁回洛阳出版。1940年改出四开两大版，版面也有所调整。1944年洛阳沦陷时，人员星散，未见再出。(见陈承铮《河南新闻事业简史》，第40-4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这段文字对《阵中日报》的源起、性质、栏目等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由此可知，《阵中日报》由蒋介石亲自题写报名。它本有“东战线”“西战线”和“北战线”三种，但因战事的发展，“东战线”“西战线”没办成，唯有《阵中日报》“北战线”，从郑州迁到信阳、西安，1939年7月又迁到洛阳，终于得以出版。

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洛阳《阵中日报》，时间上从1937年10月26日起，一直到1944年初为止，虽然其间有休刊，有缺失，但总体说，出报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抗战阶段。

近年来，对《阵中日报》的研究又有了新的信息。

有报道称，《阵中日报》“东战线”不止出版1个月，而是3个月。它是由冯玉祥的第三战区军委会在抗战爆发后不久主办的，1937年10月13日，战火威胁苏州时，《阵中日报》东战线停办(见1987年12月《新闻记者》之《东战线阵中日报发行始末》)。

而《阵中日报》“西战线”呢，由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于1938年元旦时在临汾开办，几经迁徙，一直坚持到1945年9月25日抗战胜利(见张原《试论抗战时期的阵中日报》，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6年第7期)。

此外，自1940年1月26日，李宗仁在老河口第五战区也办起了《阵中日报》，一直坚持到到1942年7月。报头为李宗仁题字，副刊为“台儿庄”。(2015年4月，当地文史委已将所收藏的该报复印，还成立了“老河口《阵中日报》研究会”，见杨菲《阵中日报与老河口》一文，2015年4月14日《襄阳晚报》)。

至此，已知的《阵中日报》便有了第一战区、第二战区、第五战区三种。而据张治中在1942年10月在陪都文化界国民月会上的发言说，“各战区有11个《阵中日报》班”(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编印《抗战五年》，转引自张中良《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版，第25页)，可见，《阵中日报》在抗战时期正面战场上是覆盖面大、影响甚广的一块重要的文化阵地。

抗战初期，前线不仅物资匮乏，斗争艰苦，而且消息闭塞，缺乏精神食粮。1938年春，据国民政府军31师战地记者盛成从台儿庄前线采访后报道，前线将士“并无书读，也没有报纸看；并闷时向村落里借来《西游记》《施公案》《七侠五义》种种小说来消遣。”(见盛成《台儿庄纪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21页)，而日本侵略者却在抗战初期就派出了他们的“笔部队”，美化侵略战争，宣传“皇道乐土”。为了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粉碎敌人的文化侵略，军事委员会责令各战区创办《阵中日报》，作为正面战场的主要舆论渠道，宣传抗日，粉碎敌人的阴谋，而它的文艺副刊，也是国统区抗战文化的一块重要园地。

蓝海(田仲济)写于1944年、出版于1947年的《中国抗战文艺史》，是我国第一部抗战文学史，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抗战文学史一直援引承袭的范本。诚如作者所言，他做了战时收集史料的“有心人”，及时总结了抗战文艺的成果，但他在书中说：“惟以文艺中心城市的相继沦陷，中心文坛的转移，文艺中心由集中而分散，以及交通不便等许多原因，这一阶段的抗战文艺史料最易失散，最难以保存，这是关心文艺史的一个遗憾。”“我们对报章上的作品和作者提得少了些，是个很大

的不足。”(注，引自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第 474 页、第 158 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

但是，几十年来时代风云的变幻，使得这些本应得到继续收集整理和加强研究的有关国统区正面战场的文学，一度成为被抗战文学史“遗忘的角落”。不仅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年代被视为“禁区”，从未再版，即使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作者在回顾其创作生涯时，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它们，极少有作家将它们收入自己的文集。拿洛阳《阵中日报》来说，如今仅有少数图书馆馆藏，已经成为濒临灭绝的“历史文物”，如果再不及时抢救，将会永远消失。

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编者对洛阳《阵中日报》“军人魂”(1939—1940)发表的文学作品作一番“钩沉”，意在填补抗战文学史的一块空白，同时对国统区正面战场的历史进行再认识与再评价。

2.“军人魂”(1939—1940)的编辑

1937 年“七七事变”不久，平津沦陷，一大批平津流亡的大中学校学生，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宣传抗日的“火种”。他们中不少人受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时代，他们或奔赴延安，或参加各战区的战地工作团、服务队、救护队等，这些充满了生机活力和爱国精神的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作用。

从 1939 年到 1940 年，洛阳《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这个战地的文化平台，就是由一群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搭建的。他们之中，有北京大学学生魏伯、燕京大学学生赵荣声、北方左联青年作家碧野，和河南大学青年作家李蕤等。他们或是这个副刊的编辑、作者，或对于搭建这个副刊起到或隐或显的保护作用。

1939 年初，国民政府军的“五虎将军”之一卫立煌被调到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此之前，他在山西坚持抗战。在 1937 年 10 月的忻口会战和 1938 年的晋东南抗战中，卫立煌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兼前敌总指挥，与八路军并肩作战，建立了友好关系。1938 年阴历春节，他带着 14 军的军长，专程到八路军总部拜年；1938 年 4 月 17 日，他去西安开会途中取道延安，与毛泽东畅谈，并下

令拨发给八路军大批军用装备；1938 年 4 月中旬晋东南日寇“九路围攻”中，他与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日军的围攻，创造了国共协同作战的成功范例（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年版）。

赵荣声是卫立煌的机要秘书，笔名任天马，1935 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共地下党员。1937 年冬他已奔赴延安，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 年春节，卫立煌拜访八路军总部时，欣赏赵荣声的才华，加之同乡关系，指名要赵到他司令部工作。为了搞好统战关系，经林伯渠、刘少奇等领导亲自批准，赵荣声到卫立煌司令部任秘书，并招募进步流亡学生，组织了“战地工作团”，到晋东南前线宣传抗日。1938 年底，卫立煌因受蒋介石疑忌，“战地工作团”被解散，工作团员劳燕分飞。1939 年初，卫立煌被调到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赵荣声仍随行，担任“同少校秘书”。

魏伯，本名王经川，河南汜水人，1932 年就读于河南省立第一师范，1935 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是北大“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1936 年与谷牧等在北平创办左联刊物《泡沫》《浪花》，是“民先”成员，中共地下党员。

抗战初期，魏伯回到家乡，组织“汜水救亡剧团”，他富有号召力，碧野、于黑丁、曾克等，都是救亡剧团成员。1938 年 3 月，魏伯化名穆毅，参加了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同年 6 月被派遣到独立第五旅任宣传队长。不久碧野到晋东南找到魏伯，随他一起到战地采访。1938 年底，“战地工作团”被解散，魏伯奔赴延安，进鲁艺学习，1942 年任米脂县委副主任。

碧野是魏伯在北平办《泡沫》《浪花》时结识的青年作家，赵荣声是魏伯在卫立煌“战地工作团”的同事，李蕤是魏伯的同乡、同学兼挚友。魏伯如一块磁石，介绍赵荣声、碧野与李蕤相识，成为这些志同道合青年之间友谊的纽带。

1939 年 1 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对国民党内的亲共分子加以排斥。卫立煌奉命从山西调到洛阳，以及他

招募的“战地工作团”被解散，都与他的“亲共”倾向有关。尽管如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仍在维持着，“摩擦”只是在暗中进行。

《阵中日报》迁洛后，由于新闻版面一律转发“中央社”新闻，编辑难度不大，但文学副刊需要专门人才，为此，报社公开招聘“军人魂”编辑，23岁的碧野，已是青年作家，通过公开考核，加上赵荣声等的暗中相助，成为《阵中日报·军人魂》的编辑。

碧野，本名黄潮洋，广东大埔县人，出身城市贫民家庭。1933年因在故乡中学闹学潮，受校方通缉，离开家乡，逃往北平。1935年碧野在“左联”机关刊物《浪花》上发表以父亲为原型的短篇小说《窑工》，经谷牧、魏伯介绍，参加了北方“左联”，1935年他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勇上战场，写下了《滹沱河夜战》《北方的原野》等报告文学，被茅盾称赞为“从前方带回来的礼物”（见《碧野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卷，第43页）。

1938年春，碧野在武汉一连出版了《北方的原野》《太行山边》和《在北线》三个反映前线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并参加了“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武汉沦陷之前，他到晋东南垣曲找到任独立第五旅宣传队长的魏伯，在晋东南前线采访，写下了《五行山血曲》《被凌辱了的十字架》等力作，发表在《抗战文艺》，以及西安《阵中日报·军人魂》等报刊上。

1938年底，“战地工作团”被解散后，魏伯和碧野一起拿着赵荣声的介绍信，搭乘《冀东日报》的汽车，准备奔赴延安。车到三原，碧野病倒了，滞留三原数月，魏伯便独自到了延安（见魏穆紫等编《魏伯文集》，五洲传播出版社，2014年版，第435页）。碧野病愈后，无路可走，又从西安回到洛阳，进了《阵中日报》社。

《阵中日报》是国民党体制内的军报，像碧野这样有着左翼作家身份的人，能到《阵中日报》工作，是与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特殊历史背景分不开的。卫立煌是较为开明的战区司令长官、赵荣声又是他的机要秘书，这些对碧野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阵中日报》并不直属第一战区司令部，而是属于第一战区政治部（政治部又直属军委会政治部），

第一战区政治部“干训处”处长吴渤海，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他知道卫立煌在山西“亲共”，所以处处与之作对（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170页），这种矛盾也表现为《阵中日报》内部的尖锐斗争。

1939年春，碧野因为“退过第一战区政治部少将秘书长的旧体诗，又不肯去给干训团政治处少将处长吴渤海的夫人生日拜寿”，得罪了顶头上司吴渤海，不久便被吴渤海找了个借口，押进军营监牢（见《碧野文集》第4卷《人生的花与果》，第232页），直到这年7月中旬，重庆王礼锡即将率领“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洛阳来，赵荣声乘机给卫立煌透风：“洛阳还关着一个作家呢”，卫立煌正准备隆重欢迎“作家访问团”，觉得此事影响不好，亲自下令，把碧野释放了（注：见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第238页）。碧野还与关押他的吴渤海一起参加了迎送“作家战地访问团”的仪式，访问团的成员大多是“文协”成员，和碧野很熟，谈笑风生，使吴渤海十分尴尬（ 见《碧野文集》第4卷《人生的花与果》第236页）。

碧野出狱后，为了加强报社的进步力量，就把魏伯的同乡同学兼好老友李蕤，介绍到报社国际新闻版任编辑，接着，李蕤又介绍了孙良田、王绍祖等朋友到报社。这一群充满热情和理想的青年的到来，给《阵中日报》带来了生机活力。

李蕤，本名赵悔深。1932年就读于开封第一师范时，就和同学魏伯一起创办文学副刊。30年代初就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1935年，李蕤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与魏伯保持紧密联系。北平学生发起了“一二·九”游行，李蕤在开封写文章声援；1936年，李蕤由孙席珍、魏伯介绍参加了北方“左联”（注，李蕤参加北方“左联”一事，可见《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第51集《左联回忆录》孙席珍的信，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65页）；1937年抗战爆发，李蕤放弃河大学业，到郑州《大刚报》当了战地记者（见黄邦和编著《大刚报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6页），到豫北前线、台儿庄等地采访。1938年夏，李蕤在武汉参加了范长江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徐州突围》一书撰稿；1938年秋，李蕤夫妇在南阳新婚后，到迁往镇平的河南大学续读；1939年5月“新唐事变”后，他携老母妻子回到故乡。此时，他恰好接到碧野邀请，就欣然到《阵中日报》工作了。

李蕤到报社一年多，除编国际新闻外，以“萧云”“流萤”“梅梁”“华弓”“赵悔深”等名，在“军人魂”上发表小说、散文、杂文、评论等16篇，同时他还帮碧野审稿，商量如何办好副刊。据他回忆，编辑部的一批青年，“当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倾向性是明显的，即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从上到下吹吹拍拍的作风十分厌恶，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他们艰苦作风，从内心同情”，他们刊登的稿件“多是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反对黑暗，追求光明的”（见李蕤《我在洛阳的跋涉足迹》，《李蕤文集》第2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468页）。碧野和李蕤还利用各自在“文协”“青记”的人脉，广泛向全国各地作家、记者征稿，并定期召集洛阳作者开会，培养战地通讯员。由于《阵中日报》新闻版都是照搬“中央社”的，而副刊“军人魂”却办得生动活泼，故而《阵中日报》被当时读者称为“半拉报”，认为新闻版没有独立价值，而“军人魂”却使人耳目一新。

树欲静而风不止。1940年春，碧野又得到洛阳集中营要逮捕他的消息。碧野感到“荆棘丛中非久栖之地”，决心逃离第一战区。此前重庆“文协”的孔罗荪，从“作家访问团”那里得知碧野的艰难处境，曾写信叮嘱碧野，说他弟弟孔柯嘉在一战区苏联军事顾问室任翻译，如果有难，可找他弟弟求援。于是碧野找了孔柯嘉，请他帮助自己离开第一战区。刚巧苏联军事顾问柯留耶夫要到湖北老河口第五战区去，孔柯嘉让碧野扮作随行人员，跟着苏联军事顾问的卡车，远走高飞到老河口第五战区去了。

碧野临走前，把准备逃走的消息告诉了李蕤，并劝李蕤也尽早离开这个凶险之地。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编辑萧乾准备到英国讲学，他是李蕤的文友，力荐李蕤去香港接替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李蕤因家有老母和怀孕的妻子，加之他自1940年6月担任了“国新社”洛阳站站长，肩负重任，不愿离开洛阳。

碧野走后，1940年6月—7月，“军人魂”一度出现无专人管理而空缺的现象，李蕤不忍心这块文艺园的荒芜，决心重振旗鼓，兼顾起副刊编辑的责任。

1940年8月日，李蕤在“军人魂”《编者的话》中说：“两月以来，因为没有专人负责，不可讳言的，许多事都堆积下来，读者和作者与编者之间也失去了密切的联系，这是使我很疚心的一点……”他重新调整了栏目，广泛联系作者，1940年8月起，“军人魂”一度回黄转绿，又出现了短暂繁荣。

可惜好景不长，1940年10月10日，李蕤也因“共党嫌疑”罪，被洛阳三青团大队长王采芹逮捕，关进洛阳西工的“劳动营”，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4名报社记者，李蕤被关数月，经过多次审讯，后经妻子宋映雪四处奔走，通过范长江的关系，找到原“国新社”成员、时任河南财政厅长曹仲植保释，才得以出狱。

李蕤出狱后，遂被《阵中日报》开除，携一家老小又回故乡去了。而孙良田、王绍祖等青年编辑，也相继离开了报社（参见李蕤《我在洛阳的跋涉足迹》，《李蕤文集》第2卷，第470—473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统区文化环境日益恶化，连较为开明的第五战区也对臧克家、碧野、田涛等进步文化人发出了“逐客令”。国统区前线的文化人转入大后方，“暴露黑暗”也成为越来越多文艺学创作的倾向。

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碧野和李蕤这两个年轻的左翼作家，在国共合作的特殊环境下，勇敢地站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军报副刊“军人魂”这块宣传抗战的前沿文化阵地上，虽然他们相继受到国民党顽固派迫害，承受了被捕入狱的惨重代价，但他们在办报时把握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大方向，靠着辛勤的耕耘，把“军人魂”办得有声有色，给国统区广大抗日将士和民众送去了急需的精神食粮，这一段“军人魂”上的文章，也是国统区抗战文学中一道亮色，为今天人们认识抗战中期社会生活留下了珍贵史料。

3.“军人魂”(1939—1940)的作者

抗战初期，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也是中国文化界精诚团结的时期。尤其是在平津沪相继沦陷后，中国人民压抑在心中的怒火，已形成火山爆发之势。时代向文化人发出了召唤，文化人也没有辜负伟大的时代。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在汉口成立；参加者400多人，不分党派地聚集在抗日大旗下。“文协”在《告全世界的文艺家书》中宣告说：“从卢沟桥的第一响枪声起，我们已经各自站上了自己的岗位，为一个目标一个信念而执行战斗的任务；现在我们更在一个大组织之内，广泛地、有计划地来发挥我们战斗的力量。”(引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5页)“文协”有组织，有纲领，有会刊，团结了全国的文化人。武汉失陷后，“文协”迁到重庆，老舍作为总务主任，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等主张；许多作家参加“战地访问团”“战地慰劳团”等等，以“笔游击”自称，站在抗日斗争前线。

1938年3月30日，范长江、陆诒等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简称“青记”)也在汉口成立，当时有60多名成员，到1938年底，已发展到600多人(见《范长江与青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220页)，1940年1月，又在桂林成立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青记”“国新社”在各地均有分会。上千名青年记者勇上前线，及时传递战地消息，有些人乃至献出生命。

抗战初期，急速反映社会变化的报告文学，成为“时代的宠儿”，“青记”“国新社”的记者们，有组织地奔赴前线，对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写作，是卓有贡献的。

洛阳《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1939年—1940年，在组稿方面是十分幸运的。因为这一时期文化空前开放，文人之间空前团结，加之洛阳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它受到格外关注。1939年7月13日重庆王礼锡率领的“作家战地访问团”从洛阳经过，几天后老舍参加的“北路慰

问团”也经过洛阳。“军人魂”因“天时、地利、人和”，吸引了全国许多著名作家和记者为副刊撰稿。

碧野是“文协”成员，李蕤是“青记”“国新社”成员，他们身后有着强大的文化援军。据不完全统计，在1939年—1940年这一年中，“军人魂”上发表文章的全国知名作家的文章30余篇，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臧克家、碧野、田涛、姚雪垠、萧乾、李蕤、张天翼、靳以、欧阳山、陈荒煤、李广田、王亚平、曾克、萧乾、安娥、王礼锡、陆晶清、严辰（厂民）、芦焚（师陀）、丽尼、力扬、吕亮耕、倪受乾、谢冰莹，陈纪滢、孙陵、胡秋原等，如果再加上“军人魂”各地作家联系的“作家书简”，所涉及的还有于黑丁、蒋弼、梅林、端木蕻良、穆木天、沙雁、林英强、杨刚、郁达夫、戴望舒、胡风……共有40多位，展示了当时名流如云、蔚为大观的作家阵容。

1940年初夏，李蕤受范长江委托，在洛阳成立了“青记”、“国新社”洛阳分会，自任站长，而《阵中日报》的青年编辑，“无一例外地参加‘青记’，支持‘青记’的公开活动”（见李蕤《我在洛阳的跋涉足迹》，《李蕤文集》第2卷）。在本书所收“军人魂”文章中，刊登了20多位“青记”“国新社”成员的37篇文章，包括子冈、史坚、一轻、彭世桢、曹弃疾、藜青（藜野）、高天、戴广德、轰振、张高峰、蒋莱、王礼锡、田涛、王亚平、邝华嘉、曾克、李蕤、白克、白菲、刘尊祺、高咏等。高咏，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1942年5月日军对山西辽县八路军总部“大扫荡”时，献出了年仅22岁的生命，被誉为“太行新闻烈士”。（注，“青记”和“国新社”成员名单，见范苏苏、王大龙所编《范长江与青记》一书，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在这些作者中，有人既是“文协”成员，又是“青记”“国新社”成员。如李蕤、田涛、曾克、王亚平等便是如此。

“军人魂”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作者。如赵荣声，化名“明明”，发表了《各个击破》《侯马车站》等一系列反映卫立煌在晋东南指挥抗战的纪实文学；方之中将军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干部，在国共合作时期是一位带领学生兵到豫北抗战的指挥员，他的《第一步跨过黄河》《踏进

游区》等纪实散文，记证了国共团结，共同御敌，到华北前线和太行山区的情景；魏伯，在晋东南抗战中写过《多多河》《五行山血曲》等名篇，后来奔赴延安，走上领导岗位；曹聚仁是“中央社”著名记者，他的《访问蒋经国先生》一文，也是“军人魂”的重要收获。

此外，“军人魂”还发表了一些不知名作者的文章，他们或是前线战士，或是沦陷区的民众，使用“藉名”“一戎卒”等笔名，从社会基层反映抗战时期的生活。

4. 全民抗战大视野

由于本书所收的文章，是发表在与时推移、篇制短小的“军人魂”文学副刊上，故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若要一言以蔽之，堪称为：全民抗战大视野。

1939年—1940年，抗战进入持久阶段的时期，有许多重大事件在洛阳汇集、碰撞，通过《阵中日报·军人魂》这个特殊的“观察点”，我们可以看到抗战中期的几个重大战役和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的不同社会生活。

“军人魂”发表的文章，涵盖的地域广阔、内容丰富。从地域上说，包括了国统区、八路军抗日根据地、沦陷区等；从内容上说，既有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也有各民众团体、普通民众在战时的日常生活小事；既有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也有后方的农工商学、妇女、儿童等支援前线的感人事迹；既有日寇对中国人民的残酷杀戮，汉奸的丑恶嘴脸，也有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所展现的是全民抗战大视野。

山西抗战，是在中国抗战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抗战爆发后，日军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从攻陷平津，到沿津浦、平汉、平绥路南下西进，迅速将战火烧到了山西，抗战的重心随即转到了山西。山西是国民政府军队的主战场之一，从忻口战役、太原会战，到中条山游击战，卫立煌与朱德、彭德怀等在山西协同作战，多次粉碎日军“围剿”，创造了国共团结抗战的范例。

本书所选文章，不少描写山西抗战的重大战役，突出的有赵荣声的

《各个击破》4篇，作者作为卫立煌的机要秘书，以近距离观察的独特视角，生动描写了卫立煌在中条山亲临战场、运筹帷幄，指挥了被日军作为战败教训写入“教科书”的西阳河战役（又称“南阳圈战役”），以及与朱德、徐海东密切配合，打伏击战，截获日军大批军用物资和200多辆汽车的东坞岭战役，这不仅是抗战文学鲜有的题材，也是抗战史上鲜为人知的资料；又如他的《侯马车站》《道经二十里岭前》，写卫立煌率部在晋东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以及与当地民众建立的良好关系。

1937年10月，山西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与八路军配合作战的忻口战役，是一次重大战役，国民政府军将领郝梦龄、刘家琪、郑廷珍等相继为国捐躯，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日颂歌，过去没有表现忻口战役的文学作品，更不要谈长篇小说了。1939年秋碧野随魏伯到晋东南采访独立第五旅，而独五旅的前旅长郑廷珍，正是南怀化战役中牺牲的英雄，碧野从将士口里得到许多素材，写下了反映忻口血战的鸿篇巨制《南怀花》，虽然如今全书已佚，只在“军人魂”上留下了《塞上》《奖章》《山乡之夜》等几个片段，却是表现忻口抗战的精彩文学记录。（注，碧野的长篇小说《南怀花》，据作者所述，1940年春写成后，寄给香港的楼适夷，被他称为“压卷之作”，但始终未见出版。这部长篇被《小说年鉴》列入1939年中国长篇小说中仅有的两部长篇之一，另一部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但仅有书名，未见其书。）

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军采取“争取外线，后退作战”的战略，击退了进犯长沙的日军，将其赶回新墙河以北，这是中国军队在防守战中第一次重大胜利，丁一的《乘胜追击记》、彭世桢的《长沙外围战的追述》、曹弃疾的《新墙河的新姿态》等，都及时报道了这次战役，详细描述了战斗情况；1940年5月，日军发动了枣（阳）宜（昌）战役，张自忠将军在这次战役中为国捐躯，高天的《一颗殒星——吊张自忠将军之战死》，深情歌颂了张自忠将军；张高峰的《豫湘战区的橡皮防线》，描写第五战区李宗仁部在豫鄂边区依靠游击队、联保和民众，建立有力的组织，使这一带成为无兵把守的“橡皮防线”；臧克家《活跃的唐河》记载了“新唐御敌”的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